

国内统一刊号: CN11-0126
主管: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主办: 新华书店总店
协办: 中国图书馆学会

新华书店报

CHINA LIBRARY WEEKLY

馆社之桥 人文之魂 阅读之美 书香之园



第554期

00 03-554

总第676期

2021年6月18日

文献保护

专刊

主办: 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图书馆报

第24期

Document Protection Issue

02 特别关注

文化和旅游部发布《“十四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

03 业界动态

《常熟文库》在国家图书馆发布
“深圳图书馆古籍数字平台”上线

04 书里书外

弘扬传统文化, 共赏诗词之美
《中国诗词大会》(第六季) 新书首发纪实

05 图书推荐

心血付出, 不负期盼
《古籍保护研究》第七辑编后记

06 图书推荐

真实一窥于阗大乘佛教传播史
记《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于阗文书——婆罗谜字体佛经残片: 梵语、于阗语》的出版

07 古籍漫步

浅议古籍引入现代图书分类体系的现实意义
我与三套经典文献的入藏

08 理论园地

《赵城金藏》在大藏经研究史上的意义

本报顾问

谭 跃(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党组书记)
聂震宁(韬奋基金会理事长)
饶 权(中国图书馆学会理事长、国家图书馆馆长)
彭斐章(中国图书馆学会顾问、武汉大学资深教授)
吴慰慈(中国图书馆学会顾问、北京大学资深教授)

本报编委
(按姓氏笔画排名)

王 波(《大学图书馆学报》副主编)
王子舟(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
王余光(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
王明舟(北京大学出版社社长)
王 媛(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副秘书长)
白雪华(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主任)
刘小琴(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
刘兹恒(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
刘惠平(中国古籍保护协会会长)
任 竞(重庆图书馆馆长)
孙月沐(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原副总经理)
朱 强(北京大学图书馆原馆长)
刘宇松(贵州省图书馆原馆长)
汤更生(中国古籍保护协会秘书长)
肖维平(首都图书馆党委书记)
何光伦(四川省图书馆馆长)
初墨利(《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社长、主编)
吴 晞(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顾问)
吴建中(澳门大学图书馆馆长)
张久珍(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书记、主任)
张明舟(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主席)
李东来(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主任、东莞图书馆馆长)
李学谦(中国少年儿童阅读推广联盟主席)
李国新(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
李 勇(河北省图书馆馆长)
李玉海(华中师范大学信息管理学院院长)
杨建忠(化学工业出版社副社长)
杨沛超(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研究员)
邱冠华(江苏省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
陈 超(上海图书馆馆长、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所长)
陈 锐(军事科学院图书馆馆长)
陈传夫(武汉大学研究生院院长)
陈胜利(文化和旅游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副主任)
陈源燕(中宣部原出版局研究员)
周云岳(陕西省图书馆馆长)
宗俊峰(清华大学出版社社长)
林 鹏(科学出版社总经理)
林旭东(安徽省图书馆馆长)
范井思(华东师范大学信息学系教授)
郑智明(福建省图书馆馆长)
倪晓建(首都图书馆原馆长)
柯 平(南开大学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教授)
赵俊玲(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副主任、河北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贾庆鹏(青岛出版集团总经理)
徐小跃(南京图书馆原馆长)
徐 雁(南京大学教授、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副主任)
徐 俊(中华书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党委书记)
索传军(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教授)
郭 斌(全民阅读促进委员会、中小型公共图书馆联合会主任)
顾 鑫(国家图书馆外文采编部主任)
黄书元(人民出版社原社长)
程焕文(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
褚树青(浙江图书馆馆长)
蔡继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副总编辑)
霍瑞娟(国家图书馆办公室主任)
魏 崇(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社长)

本报投稿邮箱
tushuguanbao@126.com

本报虚假失实报道举报电话
010-88361919
转载本报文章
请与本报联系并注明出处

文化和旅游部发布《“十四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

本报讯 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发布《“十四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简称《规划》)。《规划》明确了“十四五”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保护的总体要求、主要任务和保障措施,系统部署“十四五”时期非遗保护工作。《规划》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牢牢把握正确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性保护、坚持依法科学保护、坚持守正创新作为基本原则,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方针,提出了到2025年的发展目标和

2035年的远景目标。《规划》明确了加强非遗调查、记录和研究,加强非遗项目保护,加强非遗传承人认定和管理,加强非遗区域性整体保护,加大非遗传播普及力度和服务社会经济发展6个方面主要任务,并通过8个专栏对传统工艺高质量发

展、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等重点工作进行了部署。《规划》从加强组织领导、完善政策法规体系、强化机构队伍建设、加强经费保障4个方面保障各项措施的落实,推动形成有利于非遗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和社会环境。

《“十四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 (摘要)

发展目标:

到2025年,非遗代表性项目得到有效保护,工作制度科学规范、运行有效,工作体系更加完善,保护传承体系更加健全,创造创新活力进一步激发,人民群众对非遗的认同感、参与感、获得感明显提高,非遗服务当代、造福人民的作用进一步发挥。到2035年,非遗得到全面有效保护,传承活力明显增强,工作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完善,传承体系更加健全,保护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在推动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和重大国家战略中的作用更加彰显。

主要任务:

(一)加强非遗调查、记录和研究

1.推进非遗调查。服务对接重大国家战略,加强重点区域、重点项目专项调查,为有针对性地开展非遗保护工作提供数据支撑。鼓励支持各地根据工作需要,在本区域内开展非遗专项调查。采取电子化方式开展调查登记,推进大数据在调查中的应用,提高调查数据采集处理效能。妥善保存调查数据、资料,加强调查成果的运用。研究启动第二次全国非遗资源普查。

2.完善非遗记录体系。运用文字、图像、音频、视频等方式,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和代表性传承人实施全面记录,鼓励对县级以上非遗代表性项目和代表性传承人实施记录。广泛发动社会记录,鼓励高校、科研机构等专业机构参与,不断提高非遗记录水平。做好记录成果的保存和公开,进一步促进社会利用。

3.加强非遗档案和数据库建设。完善档案制度,制定非遗档案和数据库建设标准和规范。加大对非遗有关文字、图片、音频、视频以及实物

资料的搜集、整理和数字化处理,充分运用非遗调查记录成果,完善非遗档案和数据库体系。加强资源整合共享,推动构建准确权威、开放共享的公共数字平台,推进非遗档案和数据资源的社会利用。

4.加强非遗研究工作。开展摸底调查,掌握全国非遗研究机构的基本情况,形成全国非遗保护研究机构名单。统筹研究力量,建立非遗专家资源库,建设非遗研究基地和非遗重点实验室。加大对中青年非遗专家的支持力度,鼓励更多中青年学者从事非遗研究工作。支持非遗传承人与高校、研究机构合作,加强理论、应用方面的研究。围绕非遗保护工作面临的重难点问题委托研究课题,推动非遗保护机构与高校、科研院所联合攻关。支持非遗研究成果的出版、发表与发布,举办学术会议,加强学术期刊建设。

5.深化中国文化基因研究阐释。全面系统研究梳理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遴选充分体现中国文化基因、涉及中华文明发源文化发祥的非遗项目。开展多学科、跨学科的综合性的研究,挖掘阐释非遗项目中蕴含的中国文化基因及其当代作用和应用途径。指导项目所在地做好项目保护工作,加强项目及其有关的古籍文献、相关实物、遗存等的系统性和整体性保护,促进融入现代生活,实现发展振兴。加强研究阐释和非遗保护成果的宣传、普及、应用。

(二)加强非遗项目保护

(三)加强非遗传承人认定和管理

(四)加强非遗区域性整体保护

(五)加大非遗传播普及力度

1.鼓励支持新闻媒体和相关机构开展非遗传播。鼓励支持新闻媒体设立非遗专栏、

专题,办好优秀栏目、节目。推动主流媒体加强非遗传播力量,建设非遗传播队伍,形成一批品牌传播项目,提高非遗传播的专业性、规范性。适应媒体深度融合趋势,充分发挥微博、微信、短视频、直播等新媒体的作用,培育一批非遗项目和传承人“网红”品牌。举办中国非遗保护年会。鼓励文化馆(站)、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等开展非遗培训、展览、学术交流、公共教育等活动。鼓励支持有关机构策划推出体现非遗内容的宣传片、纪录片、公益广告等。

2.广泛开展非遗展示展览活动。结合“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传统节日,开展非遗展览、展示和展演活动。继续举办中国成都国际非遗节、中国非遗博览会、中国原生民歌节、全国非遗曲艺周等重大活动,提高活动举办水平。组织开展“文化进万家”春节元宵节系列文化活动。举办黄河流域非遗大展、大运河非遗展、长江流域非遗展等区域性展示展览活动。根据非遗不同门类和项目特点,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举办传统音乐、传统戏剧、传统技艺、传统体育、传统医药等专题性展示展览活动。鼓励支持各地结合本地资源优势和民众需求,举办区域性非遗展示展览活动。加强非遗展示展演活动及有关场所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3.推动非遗普及教育。推动将非遗融入国民教育体系。鼓励地方根据实际情况组织编写非遗教材。鼓励中小学开设非遗特色课程,支持传承人参与教学,加强非遗师资培养。鼓励建设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特色中小学传承基地,推动职业院校设立民族传统技艺等相关专业。加强高等院校非遗学科体系和专业建设,支持有条件的高校自主增设硕士点和博士点。引导

社会力量参与非遗教育培训,广泛开展社会实践和研学活动,建设一批国家非遗传承教育实践基地。推动非遗进校园,支持学校开展非遗展示、展演、竞赛及互动体验活动。

4.完善非遗传承体验设施体系。统筹建设利用好国家非遗馆,建设20个国家级非遗馆,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建设地方非遗馆,推动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配套改建新建传承体验中心,鼓励建设具有民族、地域、行业特色的非遗专题馆,鼓励社会力量兴办非遗传承体验设施,形成包括非遗馆、传承体验中心(所、点)在内,集传承、体验、教育、培训、旅游等功能于一体的传承体验设施体系。研究完善非遗展览展示场所管理制度体系,探索建立非遗展览展示场所备案和评估定级制度,支持制定、实施非遗展览展示相关标准。

5.加强对外和对港澳台交流合作。加强非遗国际传播,充分运用非遗资源,讲好中国故事。积极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有关非遗工作,加强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非遗保护合作,参与、倡导、推动双边、多边交流与合作,加大非遗保护国际人才培养力度。鼓励各驻外使领馆、海外中国文化中心、驻外旅游办事处等驻外机构开展我国非遗的宣传推广。配合重大文化交流项目、利用国际知名节会,举办非遗展示、交流活动。支持非遗相关产品走向海外市场。推动内地与港澳非遗交流合作,支持港澳做好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的申报管理工作,加强对传承人的支持扶持。鼓励台湾同胞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工程,促进大陆和台湾地区的交流合作。

(六)服务社会经济发展……

《常熟文库》在国家图书馆发布

本报讯 6月8日,《常熟文库》新书发布会暨学术座谈会在国家图书馆举行。本次会议由中共常熟市委、常熟市人民政府主办,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中共常熟市委宣传部、常熟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承办。国家图书馆党委书记、副馆长魏大威,常熟市委书记周勤第等领导出席会议。国内有关高校和图书馆专家、在京的常熟籍领导和专家代表、苏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以及常熟市领导共计80多人出席活动。

与会专家认为,作为地方文献的集大成之作,《常熟文库》记载并反映了常熟人文、社会和自然的发展变化,比较全面、系统、真实地反映了常熟地区清中期以来前历史文献的主体面貌,是对常熟地方文化的全面总结,是江南文化乃至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既是常熟地方的文化财富,也是我国优秀历史文化的缩影,具有极高的历史研究价值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魏大威和周勤第共同为《常熟文库》新书揭幕。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浙江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苏州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获赠该书。

《常熟文库》编纂工程于2018年启动。常熟市委、市政府站在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的高度,与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合作,将《常熟文库》编纂出版工程列入宣传文化发展专项资金扶持首批重点项目,汇集了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等大型图书馆文献资源,同时,充分利用常

熟图书馆、博物馆馆藏资源,挖掘常熟历代学术著述成果。初编于2019年底完成,精装16开,全100册,选编常熟地区清初以前重要文献401种,内容涵盖学术、文艺、历史、科技、医学等多个领域,其中有为数不少的稿(抄)本、批校本、珍稀刻本。

此外,由国家图书馆、常熟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共同举办的“道承东南——虞山文化流派展”6月8日起在国家典籍博物馆开展。展出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历代常熟藏书家的藏书、抄书、批点书、校跋书及著书等珍贵古籍,常熟博物馆藏虞山文化流派相关文物,展示了以王翬为首的虞山画派、钱谦益为领袖的虞山诗派、严澂所创立的虞山琴派、林皋为代表的虞山印派的精品。



图片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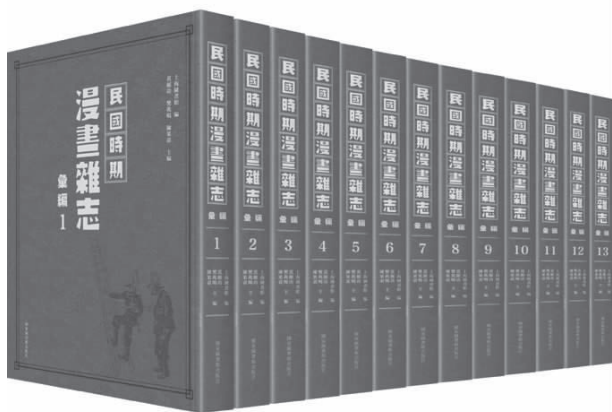


本报讯 近日,在浙江大学建校124周年校庆期间,浙江大学图书馆古籍部正式开馆,献礼校庆。

浙江大学图书馆古籍部的馆藏古籍总量达十八万余册,其中包含善本古籍两千种两万册。2009年,经国务院批准,浙江大学图书馆被列为第二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所藏古籍上起宋代,下迄民国,四库齐备,善本众多,有近百种善本书为全国独家典藏,有一百七十五部善本陆续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居全国高校第二位。

在当天举行的开馆仪式上,健洲控股董事长、普华资本投资合伙人周公敢捐赠了元刻本《资治通鉴纲目》第三十一卷、明成化刻本《资治通鉴纲目》第三十二、三十三卷。还同步举行了中文学科资料室揭牌仪式、历代墓志原石捐赠仪式、艺术与考古学院与图书馆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浙江大学图书馆写本文献搜集保护与研究中心”备忘录签约仪式、浙江大学图书馆中元古籍修复中心成立签约仪式等。

李灵 朱原之



本报讯 近日,由上海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主办的《民国时期漫画杂志汇编》新书发布暨出版座谈会在上海丁聪美术馆召开。

《民国时期漫画杂志汇编》共32册,是国家图书馆“革命文献与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整理出版项目之一。该汇编精选民国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漫画杂志69种,其中包括《上海波克》《上海漫画》《时代漫画》《抗战漫画》等艺术性、思想性俱佳的刊物,代表了民国时期漫画艺术的最高水准,既可作为研究民国时期漫画史的基本素材,又可当作民国时期社会史的一面镜子。

参会专家学者、漫画家后人与图书馆界代表围绕《民国时期漫画杂志汇编》一书进行深入探讨和交流,大家认为,本套丛书的出版为漫画爱好者提供了更多学习和借鉴的珍贵素材,对民国时期漫画家作品辑佚具有重要意义,为研究民国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提供了新史料。

“深圳图书馆古籍数字平台”上线

本报讯 近日,由广东省古籍保护中心和深圳图书馆联合举办的“深圳图书馆古籍数字平台”上线发布会暨古籍文献保护专题讲座在深圳图书馆举行。广东省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倪俊明,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公共文化处处长聂昌友,深圳图书馆馆长张岩以及来自珠海、佛山、东莞、江门、肇庆、潮州、汕头等广东省内多家公共图书馆和高校图书馆的负责人和业务骨干参加会议。

张岩馆长在发布会上介绍,自“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以来,深圳图书馆在广东省古籍保护中心的指导下,于2012年启动古籍普查工作,迄今完成了馆内300部4076册古籍的普查工作,并录入到“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基本数据库”。从2016年开始,深圳图书馆对馆藏古籍集中进行数字化加工,建设古籍文献数据库,搭建古籍数字化平台,目前总计扫描、处理古籍数字化图像约45万页。本次“深圳图书馆古籍数字平台”首批上线约230部2700册数字化古籍,是深圳图书馆古籍保护和开发工作的重要成果,这让广大读者和研究者可以足不出户浏览古籍资源。

深圳市点通数据有限公司万享副总经理作《借力人工智能,深挖古籍资源》的发言,简述了古籍数字资源建设的三个阶段:(一)数字化,(二)数据化,(三)知识化。倪俊明作《广东省古籍保护工作的回顾与展望》专题讲座,从“中华古籍保护计划”谈起,对近年来广东省古籍修复、古籍数字化建设、古籍保护人才培养、古籍文献整理出版及古籍保护宣传等工作经验与成果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梳理与总结。刘玉洁 陈项颖

“《永乐大典》的回归和再造”展览在国家典籍博物馆开展

本报讯 由国家图书馆(国家典籍博物馆)主办,浙江下沙奥特莱斯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协办的“珠还合浦,历劫重光——《永乐大典》的回归和再造”展览近日在国家典籍博物馆开展。

时隔近三年,国家图书馆再次推出《永乐大典》主题展览,精选包括善本、舆图、手稿等在内的馆藏精品,系统讲述《永乐大典》的编纂经过、版式外观、聚散流变、辑佚影印,着重突出在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下,其“明珠还于合浦”的历程及国家图书馆对《永乐大典》的修复、保护、整理与利用。同时,成立《永乐大典》研究中心,以《永乐大典》学

术研究、学界服务、宣传推广为核心,持续推进古籍保护事业发展和中华传统典籍文化传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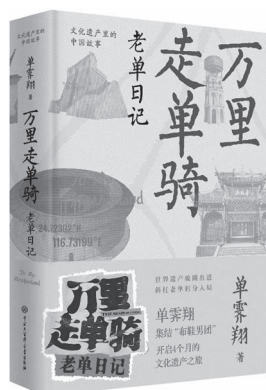
本次展览共分为“大典犹看永乐传”“合古今而集大成”“久阅沧桑惜弗全”“遂使已湮得再显”“珠还影归惠学林”5个单元,通过讲述这部巨著的前世今生,全面展示《永乐大典》蕴含的丰富而宝贵的知识体系、思想观念、人文精神和道德规范。

展览特设单元展示《永乐大典》的回归和再造,以图表加重点事件描述的形式,细致全面地整理了《永乐大典》通过政府拨交、海外送还、藏家捐赠、员工采访等多种途径,入藏国家图书馆的历程。

单霁翔《万里走单骑:老单日记》在京首发

本报讯 6月10日,2021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北京市主场活动开幕式在周口店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举办。以“文化遗产里的中国故事”为主题的图书《万里走单骑:老单日记》亮相活动现场,并举行了新书发布仪式。该书作者、中国文物学会会长单霁翔化身世界遗产“推广人”,与现场读者交流了从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初心。

《万里走单骑:老单日记》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讲述了中国大地上的世界遗产故事。全书以文化遗产传承、利用和保护的故事为经,以作者“老单”在9个省份、12处遗产地参加《万里走单骑》节目录制的见闻和随想为纬,记述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在文化遗产中寻找和守望中华文化根脉的故事。在节目录制的独特视角下,作者以日记为载体,用一贯金句频出、举重若轻的语言风格带领读者开启一场世界遗



产之旅。轻松的图文内容背后,是厚重的学术积累、忘我的倾情投入和坚定的文化自信。

单霁翔建议大家看完这本书后,一定要收藏好,因为未来还会有第二部、第三部,收集起来就是一部关于世界遗产的百科全书。新书发布仪式结束后,同名节目《万里走单骑》第二季也宣布启动。

弘扬传统文化,共赏诗词之美

《中国诗词大会》(第六季)新书首发纪实

6月6日,中华书局在北京市东城区第一图书馆举办了《中国诗词大会》(第六季)新书首发式。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陈永刚,中华书局执行董事徐俊,《中国诗词大会》(第六季)节目题库出题组专家李天飞,以及《中国诗词大会》的几季冠军选手——雷海为、陈更、彭敏、陈曦骏出席了此次活动。《中国诗词大会》是中央电视台组织的一档大型、全国性的有关中华经典诗词记诵、解读、赏析、阐释的文艺娱乐性节目。以“赏中华诗词,寻文化基因,品生活之美”为宗旨,通过比赛的形式,带动全民走进古诗词的世界,分享诗词之美,感受诗词之趣。中华书局在节目台本的基础上,以展现知识点为主旨,保留了整体的节目结构与形式,让节目以图书作为最终的呈现方式,更加丰富、充实、立体、完备。

从电视到图书:融媒体“出版+”一直在路上

主持人:《中国诗词大会》是一档推广阅读古诗词的经典节目,已经播出了六季,得到了各行各业人士的无数好评与称赞。我们今天看到的《中国诗词大会》(第六季)图书,是在此基础上提炼、润色而成。那么这本书对普及古典诗词、领略传统文化有什么现实意义呢?

陈永刚(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人生自有诗意”,诗意就在身边。我一直是《中国诗词大会》的忠实观众,这个节目既有先贤志士的家国情怀与民族大义,也有芸芸众生的苦乐欢笑与精神旨趣。现在,中华书局用图书的形式,将这种震撼与美丽记录下来、沉淀下来,让更多的读者在超越荧屏的语境下,细细品味诗词之韵味,自由徜徉于诗词之海洋。十几年前,中华书局出版的央视“百家讲

坛”系列图书,曾经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而《中国诗词大会》(第一季)的图书也是由中华书局出版的,获得了非常好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今天,《中国诗词大会》(第六季)再次由中华书局出版,这是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合作,是用诗词的力量揭示了一个道理:知识的多方位呈现是我们共同的愿望,也必将为我们带来更广泛的合作。

徐俊(中华书局执行董事):非常荣幸央视这次将《中国诗词大会》(第六季)图书交给中华书局出版,让我们有机会用一部精美可读的图书,与更多的读者分享《中国诗词大会》的魅力。很多年以前,我听过一个故事:一个即将留学海外的学生向老师辞行,他问老师自己此去还有什么要交代。老师说,带上一本《英

汉词典》,另外再带上一本《唐诗三百首》吧。带上《英汉词典》自然是为了语言交流的需要,而无论你走到哪里,只要你还能随口背得出一首唐诗,就意味着在精神上你还是一个中国人。

我们在接到《中国诗词大会》台本之后,马上组织人力进行了细致的编辑工作。节目一共10期,每期五个环节:包含知识问答、情境分析、诗词填空、飞花令以及每期的擂主争霸。鉴于图书与电视呈现形式的不同,我们在节目台本的基础上,以展现知识点为主旨,在保留整体的节目结构与形式的同时,对节目内容进行了梳理,进行更加适合阅读体验的调整。比如节目中是对每一个选手进行出题,图书则将相同的题型进行归类整合,避免读者在阅读的时候会觉得过于



零散琐碎。另外我们还恢复保留了节目中因时长原因而剪辑掉的嘉宾解读,使解读更加丰富。

留白、含蓄、浪漫、激昂、精致……道不尽诗词之美

主持人:今天,我们邀请到了的几位冠军选手。想请几位冠军跟大家谈一谈,你最喜欢的、印象最深的一首诗词是什么?

陈更《中国诗词大会》第四季冠军):最近最喜欢的是李益的《夜上受降城闻笛》。中国古典诗词有一个很大的和西方文学不一样的特点是“留白”,就是不会把话都说出来,会有大量空间。这首诗的画面感很强,同时也很含蓄,作者非常思念故乡和孩子以及年迈的父母,但是他不直说,牵挂和思念已经浸入了如霜的月色、如雪的细纱里,这是这首诗的艺术魅力所在。

主持人:中国诗词与绘画、音乐息息相关,你作为工科生,具有超强的逻辑思维能力以及细致的观察能力,对于学习古典诗词有什么样的帮助吗?

陈更:理工科即便是在现代化程度很高的今天,依然有许许多多的科学问题没有解决,就像无法用铰链、绳索、螺栓等各种机械结构来模拟人的膝关节一样,机器人的运动非常笨拙,人的步态到目前也没有研究清楚为什么这么高效节能……我无法知道这些问题是否在我有生之年能得到解决,就像中国古典诗词一样,读了很多年,仍然有很多的无穷空间值得探索。

主持人:彭敏老师是《诗刊》编辑部的编辑,在《中国成语大会》《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中国诗词大会》都得过冠军,足以傲视群雄。请问您最喜欢的诗词是?

彭敏《中国诗词大会》第五季冠军):我最喜欢的诗是《西洲曲》,这是一首特别浪漫的爱情诗。尤其是最后的四句话:“海水梦悠悠,君愁我亦愁。南风知

我意,吹梦到西洲。”

主持人:您对新诗也比较有研究,如何看古诗与新诗的异同呢?

彭敏:现代诗有很多主题,表达方式与古诗词相通,很多新诗中都能看到古典诗词的影子,对于这样的新诗欣赏是古今相通的。当然,也有一些新诗的主题是一般人不能理解的。

主持人:今天也邀请到了文化学者、《中国诗词大会》的出题人之一李天飞,以及另两位总冠军选手——第三季总冠军雷海为、第六季总冠军陈曦骏。海为你好,“一位外卖小哥的逆袭”,这背后需要多么刻苦的努力啊。经常去书店读书背诗,回去之后默写,等外卖的零碎时间都用来读诗,成功的背后需要的是不断的付出与努力。如今海为已经是一名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也把学习诗词的心得体会传授给了学生。您分享一首最喜欢的诗词吧。

雷海为《中国诗词大会》第三季冠军):我最喜欢的是岳飞的《满江红》。

主持人:学习诗词对您的人生、对您现在的经历有着怎样的影响呢?

雷海为:学习诗词对我的好处有很多,归纳起来有两点:一是积累了很多丰富的文学知识、文学素养。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对古文兴趣不大,但是后来背诵很多诗,对古文兴趣越来越浓厚了。二是丰富了我的个人世界,让我拥有了良好的心态。以前经历了很多困境,我在上海有过一段漂泊经历,没钱租房,就在楼道里睡觉。虽然那时生活很困难,但是我并没有觉得很颓废,反而觉得这是生活对我的历练,我想着毛主席的《七律·长征》,那么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遇到



的这点困难又算得了什么?

主持人:您的分享也验证了“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这两句诗。曦骏现在在上海工作,是一位警察,也是最新一季的总冠军,请您也分享一首诗词,讲述一下诗词对您的影响。

陈曦骏《中国诗词大会》第六季冠军):我选择的诗可能大家不是很熟悉,它反映了我读诗、学诗的过程,这是唐代诗人郑谷的一首诗:“一卷疏芜一百篇,名成未敢暂忘筌。何如海日生残夜,一句能令万古传。……”我学习诗词多年,有了一些小成绩,但是不敢放弃努力。中华书局出版的一些书,如“康震讲”系列,我是望尘莫及的,只能亦步亦趋,不断努力。《中国诗词大会》的图书我从第一季开始一直在追,每次看完节目之后都会拿着书看。

主持人:这位是出题的老师李天飞,天飞在节目中挖了很多很多“陷阱”。李天飞这些年特别注重给孩子写书,包括

给孩子写解读诗词方面的书。天飞自己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女儿,对女儿的言传身教也很重要。今天有很多小朋友在,对于小朋友学习诗词,您有什么建议呢?结合您对孩子的教育,跟大家分享一下。

李天飞《中国诗词大会》节目题库出题组专家):很多家长和我聊,我让孩子背诗,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呢?高考考完了就完了嘛,其实并不是这么简单。让孩子读诗词能够培养语言的精致性,这件事很重要。任何一个时代,你的语言能够精致,从小的方面举例,去写个小文案,都比别人强。举一个小例子,前两天我去了一趟衡水,看到了一条标语:“河北驴肉火烧是中国传统美食。”这句话没问题,但是这句话并不精致。后来我进了一家小店,小店中也有一句话:“品河北驴火,游千年古城。”这句话并不是诗,但是这几个字是合乎平仄的,说明写这个文案的人懂诗。这种语言的精致性,在任何场合、任何工种,都是有必要的。

心血付出,不负期盼

《古籍保护研究》第七辑编后记

□王振良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主办的《古籍保护研究》第七辑编竣,承办单位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的诸位编辑,为此付出了诸多的心血。随着第四、五、六辑的相继出版发行,编辑部也感受到了古籍保护领域同仁的热切目光。

本辑共刊出稿件20篇,分别纳入10个栏目。

“古籍保护综述”栏目刊文2篇。王沛《“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少数民族古籍保护情况综述》全面梳理了在“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推动实施过程中,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全面贯彻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牢固树立“保护民族古籍、增进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的理念,在制度设计、古籍普查、价值挖掘、文脉传承、人才培养等方面,积极推进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及民族地区古籍保护工作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文章还从完善协调机制、制定相关规范、改善保管条件、推动再生性保护、开展人才培养、加强宣传推广等六方面提出了深化少数民族古籍保护的建。包菊香《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古籍书目数据库建设实践与思考》介绍了“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平台”“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基本数据库”“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数据库”“海外中华古籍书目数据库”“中华历代古籍书目数据库”建设情况,论述了各自的功能和特色,并就今后工作提出有价值的建议:一是加强古籍书目数据库之间的互联互通,研发一站式检索发布平台;二是针对同书同版本著录不尽相同现象,加强对数据进行规范统一;三是关注国际编目界先进理念、编目技术,推动数据的国际交换;四是深化数据库条目的分类和主题标引,揭示书目之间的内在关系。

“普查与编目”栏目刊文3篇。周余姣、沈志佳《美国华盛顿大学图书馆收藏易学类古籍考略》著录了美国华盛顿大学图书馆收藏的易学类古籍46种47部324册,按照《中华古籍总目分类表》从书名、卷数、索书号、撰人、版本、册函数、版式、版心、序跋、内封、藏书来源等方面进行详细的内容揭示,并通过与“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基本数据库”和《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易学书目》比对,总结出该馆易学类古籍的收藏特点:门类较为完备,存有稀见版本。胡艳杰《思路、方法与类型——对〈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图录〉编纂的几点思考》指出,作为“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基本工作之一的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在2020年底基本完成,作者提出在此基础上编纂出版《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图录》的设想,认为这是深入推进全国古籍普查工作的重要举措,对古籍保护有着极为重要的

实践意义。文章还针对图录的编纂思路、工作方法、编纂类型等提出具体的操作性建议。吴雪梅、芦婷婷《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普查工作实践与思考》概述了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历时十年的古籍普查过程,总结了具体经验并进行了深入思考,可为《中华古籍总目》编纂、民国文献普查、碑帖拓片普查等提供借鉴。

“修复与装潢”栏目刊文4篇。陈丽萍《修复与重现——从学术研究角度看敦煌文献修复的贡献》以作者接触到的三类敦煌文书为例,说明了敦煌文书的修复工作对文书内容的研究以及判定不同藏地文书的缀合关系所起到的重要推进作用。《湘山志》是广西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特色方志,但破损严重。陈福蓉《〈湘山志〉修复记》介绍该书修补复原时,在裁书页和齐栏环节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最后在严格遵循古籍修复原则的前提下,大胆尝试创新,找到较为理想的解决办法。此可为同类古籍修复提供借鉴。吴庭宏《古籍修复原则与方法研究——以黄丕烈藏书题跋之古书修补论述为基础》通过对黄丕烈藏书题跋中关于古书修补论述的解析,指出黄丕烈提倡修补古书要保持古书原貌,古籍修复人员应提高自身素养,继承黄丕烈的古书修补思想,在古籍修复中严格执行“整旧如旧”基本原则。臧春华《中国古籍修复题跋举隅——见于〈上海图书馆善本题跋真迹〉》列举了203部古籍中关于修复的题跋。因为传统文献对古籍修复方法记载不多,而这些题跋对古籍破损情况、修复时间、修复技法等都有所揭示,故可供古籍修复研究者和实践者参考。

“保藏与利用”栏目刊文3篇。易晓辉《浅析木质装具对古籍文献的影响因素及改进措施》指出,装具作为古籍文献的保护体,制作材料的安全性直接影响纸质文献保护效果。木质材料在传统古籍文献装具制作中被广泛应用,然而从214编后记文献保护涉及的相关指标来看,大多数木材也存在一定缺陷,尤其是木材的酸性和有机挥发物会对纸张寿命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如何兼顾传统习惯和科学保护的要求,解决木材的酸性和挥发物缺陷,成为文献保护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文章提出,在制作木质装具时应科学选材,做好常规处理,同时对木材采取碱性改性、热处理、固化封闭等措施,使其安全性能得到改进。吴芹芳、谢泉《武汉大学图书馆利用RFID管理古籍的设想》以武汉大学图书馆为例,探讨了提高古籍清点与管理效率的可能性方案,认为RFID技术具有非直接接触、远距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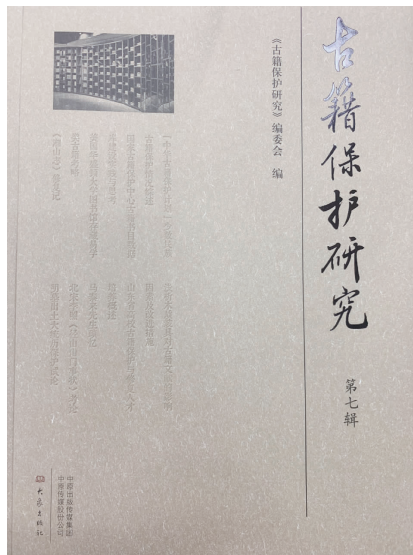
跨介质识别、自动批量处理等优点。文章着重探讨了RFID应用于古籍管理的可行性、其可实现的功能,以及目前待解决的问题。任江鸿、岳蕊丽《西藏山南、日喀则和阿里地区寺院古籍文献收藏、整理、保护现状调研报告》介绍了2009年西藏古籍保护专项工作启动以来所取得的巨大进展。作者采用实地走访、网络查询和统计分类的方法,对山南、日喀则和阿里地区6座重要寺院的古籍文献收藏、整理、保护现状进行了调研,并通过对寺院僧人和当地民众的采访分析认为,这些古籍文献基本处于寺院自主管理状态,管理水平亟待提高。

“再生与传播”栏目刊文1篇。许海燕《化身千百,垂之永久——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仿真影印〈永乐大典〉综述》介绍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启动的仿真影印《永乐大典》项目概况,从六个方面论述了仿真影印《永乐大典》的特色与价值:收录罕见的两册乾隆御题《永乐大典》,最大限度呈现原书剪报、书信、函套等信息,尽量还原原书封面、封底、四库馆签佚书单,保留原书收藏机构的藏书印章等信息,保留原书的衔名页,恢复了罕见的幸存连卷。

“人才培养”栏目刊文2篇。李勇慧、桑丽娜《山东省高校古籍保护与修复人才培养概述》介绍了山东艺术学院、山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和莱芜职业技术学院有关古籍保护与修复人才培养情况,指出它们与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山东省古籍保护中心开展的公藏机构古籍保护工作人员在职培训齐头并进,有效缓解了山东省古籍保护与修复专业人才不足的困境,开创了从专科到本科再到硕士研究生学历教育的多梯次人才培养格局。肖辉英、赵彦昌《辽宁大学古籍保护与修复人才培养的探索与实践》从辽宁大学历史学院古籍保护与修复方向人才培养现状出发,对中国古籍保护人才培养模式进行了初步探索,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探讨了图书馆古籍保护中心与高校联合培养古籍人才的可行性问题,为我国古籍人才培养提供了新思路。

“史事与人物”栏目刊文1篇。何义壮撰、凌一鸣译《马泰来先生琐忆》通过具体鲜明的事例,回忆了文史学者、图书馆专家马泰来对北美东亚图书馆事业发展的贡献。何义壮作为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特别记述和表彰了马泰来就职该馆期间,在图书保藏、影印出版、目录更新以及中美图书馆界的业务合作与学术交流等领域做出的重要贡献。

“版本与鉴赏”栏目刊文2篇。唐宸《北宋李照〈径山山门事状〉考论》的研究对象是已知最早的径山禅宗祖庭开山史料,具有重要的文



献价值,惜无单行本传世,《全宋文》亦失载。本文在复原《径山山门事状》文字、考证作者生平与编纂经过的基础上提出:《径山山门事状》是由国一、无上、法济三位祖师的行状组成的合状,所谓李照《径山集》并不存在;《径山山门事状》详细记录了径山寺开山事迹,与《景德传灯录》等灯史著作相得益彰,成为后世文人创作的重要素材,其体例为后世径山寺志奠定了基础。本文还对历代径山志的版本源流进行了考辨。《曲石丛书》是李根源寓居苏州时主持刊刻的丛书,邹桂香《〈曲石丛书〉的版本、编撰特点与文献价值研究——以苏州大学图书馆藏曲石精庐本为中心》通过对《曲石丛书》的考察,认为由李根源亲友门生主要担纲文字审校工作,体现了浓厚的孝亲尊师思想。同时该书保存了云南、苏州两地的乡邦文献和西南边疆史地、舆图资料,有助于厘清相关金石文物的历史遗存,为深入研究李根源的寓居生活和社会交游提供了珍贵线索和翔实资料。

“书评与书话”栏目刊文1篇。凌一鸣《打开历史现场的钥匙——评〈民间历史文献整理概论〉》指出,民间历史文献是历史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历史学研究的对象和工具。中山大学图书馆在民间历史文献收藏与整理方面积累了大量经验,《民间历史文献整理概论》一书即该馆研究馆员王蕾及其团队提炼总结而成。全书就民间历史文献收集、典藏、分类、编目、修复、数字化等方面展开深入研究,不仅具有较强的实践指导意义与统括性,也对收藏与研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书评认为《民间历史文献整理概论》是“一部开创性的著作,本书建立的研究模式、研究方法乃至未尽完善之处都是后来研究者值得参考的重要资源”。

“研究生论坛”栏目刊文1篇。乔金丽《明墓出土大统历保护试论》总结考察了7座明墓出土的16种22册大统历(其中一册仅存封面),指出出土的大统历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相关部门应在既有基础上积极完成大统历的修复,重视修复档案的建立,并加强相关的影印出版与数字化工作。

真实一窥于阗大乘佛教传播史

记《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于阗文书——婆罗谜字体佛经残片:梵语、于阗语》的出版

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于近年入藏一批出自和田的纸本文书,其中梵语和于阗语文本用婆罗谜字体书写,且属于典型的丝路南道字体,又可总括分为正体和草体,正体用于佛教文献。《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于阗文书——婆罗谜字体佛经残片:梵语、于阗语》的内容即是对其中佛经残片的转写比定和对相关研究情况的说明。

古代于阗作为丝路南道重镇、大乘佛教重镇,在西域历史、丝路历史和佛教发展传播的历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此次的文书整理也体现出于阗主要盛行大乘佛教的特点。梵语文书全部为佛经,除一些细小碎片由于字符太少不足以判断内容外,基本都属于《般若经》类和《妙法莲华经》;于阗语写本大部分内容属于《僧伽吒经》。这三类经都是曾在于阗故地非常流行的大乘经典。

这些纸本佛教经文的形制,同以往出自和田地区的材料一样,并不统一,即使是在同一种经文范围之内,也有在尺寸、每面行数、每行字数、穿绳孔位置等方面各不相同的情况。此次的材料全部为残片,几乎没有完整的纸张,小的残片甚至只有一两个字符,有些残片中还有可能的抄写错误。入藏之前这些材料已有部分拼合归类,入藏时保留了当时的状况,在同一原始编号下有时有多个残片,并且这些残片时常有属于不同纸叶或者不同经文甚至不同语言(GXW0422混合了梵语和于阗语的残片)的情况。类似这样在按照推测的语言或书写字体进行编号时,有时会引起无法避免的错误,特别是当残片比较小而字体又相似时,这与在英国图书馆所藏吐火罗语和梵语残片时有混杂的情况相似。其书写字体与此前所知出自和田的典型的丝路南道正体婆罗谜佛经非常一致,基本都可归于德国中亚字体学专家Lore Sander 博士所谓中期“南突厥斯坦婆罗谜”。但具体的笔迹又各自有别,可判断属于不同的抄写者或不同写本。

这些材料虽然数量不是很多,部分材料非常残破,但在比定后,其文字内容透露出一些细节,值得深入探讨。笔者的部分思考放在了注释中,但总体上本书是对原始材料的识读转写和比定,有些涉及文本历史发展的现象和对于重构古代语言有意义的线索,可在将来再进行更多深入的探讨。

梵语残片较多属般若类。比较大的残片对应文本多为大品般若,如《二万五千颂般若》,有2叶对应《一万颂般若》的内容。《一万颂般若》此前只有藏文本存世,此次梵语对应残片的发现令人意外。一些碎小的残片对应不同的般若文本,但由于保留字符太少,不能从整体上说明对应的情况。梵语残片中有3叶属于《妙法莲华经》,不论文字内容还是字体都与著名的主要藏于圣彼得堡的所谓“喀什本”大同小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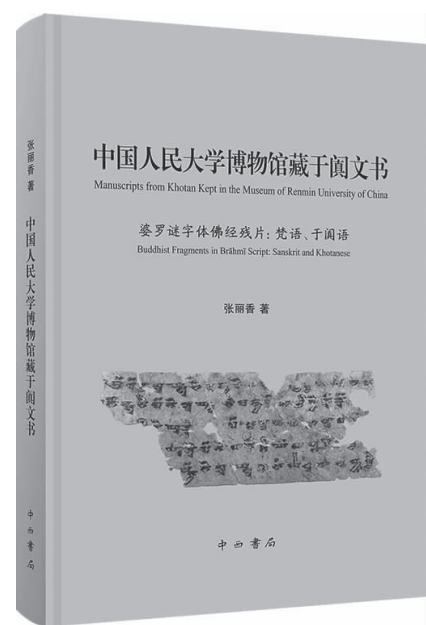
于阗语文本目前比对出的《僧伽

吒经》残片共涉及6个馆藏编号,20件残片,可拼合为5叶,其中有首次发现的新的于阗语材料。这部曾在从犍陀罗到丝路南道范围内十分重要的、被一再重抄的佛经此前只能根据现存于各处的残片恢复出于阗语文本大约三分之二的內容,本次比定为原有的近150件残片增添了新一手材料。《僧伽吒经》虽然在汉地不如《般若经》和《法华经》那样影响深远,但在新疆丝路南道就发现有很多于阗语写本,在吉尔吉特发现的也有不下10份梵语写本或残片,其数量之多可以说是颇为令人吃惊的。考虑到其在大乘佛教历史中可能的宣传作用,这也许是理所当然的,同时也足以说明这部经的重要性——特别是在于阗。

在转写时,由于目前国际学界通行的梵语和于阗语的转写体例并不相同,所以本次刊布的材料,虽然都以同样的丝路南道婆罗谜字体写就,还是采用了两套不同的转写系统,特此说明[但在转写过程中,笔者确实感到这一方式未臻完善,特别是将梵语和于阗语列于同一本书之内时(两种不同语言的书写不但都使用的是婆罗谜字体,且同属其中的丝路南道正体)。段晴《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西域文书:于阗语卷(一)》(2015)中涉及一份“未知名梵文残经”(第7页),转写中采用了全书统一的通行的于阗语写本转写体例,可以参考,但因其全书只有一件十分小的梵语残片,与本书情况又有不同]。本书目的在于刊布材料和比定内容,不做对勘或更进一步的编辑,只在每一部分内容前给出一个有关文本,特别是涉及新疆写本现状的简要介绍。书中给出的残片尺寸为博物馆原始数据,只有个别原来没有尺寸数据的由笔者作了测量补充。

本书按内容排列,即将同一类经文的内容放在一起,分为四个部分,般若经、般若类(未比定)、法华经和僧伽吒经,个别小块残片由于文字不足无法判断者放在其所属编号下一并列。图版部分则以馆藏编号顺序排列,以便核对。再以馆藏编号顺序列出残片对应的文本内容,以便于查看(见表)。

从着手这项工作起至2017年的一段时间里有一个比定工作的初步成果,此后有所中断,本次对之前的工作做了部分改动,部分材料后期还会有进一步编辑整理。在这过程中,特别是在2017年前,得到很多师友同事的支持鼓励,在此一并致谢。



馆藏编号	残片数	语言	内 容
GXW0287	27	梵语	二万五千颂般若,2般若类或其他,25
GXW0289	5 属同一叶	梵语	二万五千颂般若
GXW0290	1	梵语	二万五千颂般若
GXW0291	2	梵语	一万颂般若
GXW0292	2 属同一叶	于阗语	僧伽吒经
GXW0391	6	梵语	二万五千颂般若,1般若类(?),4未明确,1(碎小)
GXW0419	4 可拼合	于阗语	僧伽吒经
GXW0420	4 可拼合	于阗语	僧伽吒经
GXW0421	3	于阗语	僧伽吒经,1未明确,2
GXW0422	9 3件可拼合	梵语 于阗语	妙法莲华经,1僧伽吒经,4未明确,4(碎小)
GXW0423	1	梵语	般若类(?)
GXW0424	1	梵语	未明确
GXW0425	9 5件可拼合	于阗语	僧伽吒经,5未明确,4(碎小)
GXW0426	4	梵语	妙法莲华经,1未明确,3(碎小)
GXW0427	3 可拼合	梵语	妙法莲华经

浅议古籍引入现代图书分类体系的现实意义

□王沁(国家图书馆国图书店)

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转变对文化事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文化是国家与民族的灵魂。古往今来,世界各族人民无一例外都受益于本民族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上产生的文化遗产。其中,古籍是最重要的载体之一。

古籍传承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是深挖民族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资源。然而长期以来,阅读、研究与利用古籍的主体大都局限于相关学科的学术圈内,少见专业以外的其他受众,普通民众对绝大部分古籍甚至一无所知。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大部分古籍语言晦涩、内容艰深使得普通读者难以亲近,但另一方面或许也因为古籍固守传统分类体系使其被现代普通读者检索利用的可能性大大减少。

我国目前对现代图书多采用《中国图书馆分类法》加以分类整理,但是对古籍的处理却采用传统的四部分类法,书目的编制依据也大体按照这样的原则,这种古今分裂的状况为普通读者的查阅带来诸多不便。早在80年代国家图书馆编制《民国时期总书目》时,吕叔湘先生就曾提出过这个问题,他在撰序时表达了对新旧分类法有朝一日实现统一的期望。

四部分类法毫无疑问本身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从文史类学科的专业研究角度看,对古籍也仍是最适合、最精准的分类方法。但是对普通读者,尤其是年轻人以及一些非相关专业学者而言,如果想在古代文献中寻找引证参考资料,这一分类体系却不那么友好。随着古籍资源开发利用工作的推进,古籍文献由面向专业人士的研究需求逐步向面向大众的文化需求转变,在保留传统分类方法的同时,将古籍纳入现代图书分类体系,比如被广泛接受的《中国图书馆分类法》,显得愈发紧迫。

与传统的《四部法》相比,《中图法》有如下优势:(1)《中图法》是一部综合性大型图书分类法,体系完备,编制技术先进,类目设置丰富,可以大致满足古籍基于内容的分类需求;(2)《中图法》对于《四部法》的辨体类目(即按书的体裁设置类目)是有益的补充;(3)《中图法》适应现代科学的发展和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可以满足当代广大读者的一般需求,使非专业读者或对《四部

法》不熟悉的其他专业学者可以通过它来检索到可资利用的古籍书目信息。

这将不仅有利于传统文化的推广,对学术的传承发展也会产生积极影响。中国的学术史历来是以书目为主要的修撰基础,凭借书目“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也是治学的不二门径。将古籍纳入现代图书分类体系中,正是对我国“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传统的精神继承。所谓考镜源流,既要知源,也要知流。源与流,本不可分割、息息相通,古籍是过去的“今籍”,今籍是未来的“古籍”。然而,当书目体系古今分家,古籍与现代图书截然分立,学术发展难免陷于源不知有流、流不知有源的断裂窘境,使书目在发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能方面留下重大缺陷,从而限制了学术的发展:“流”固然因此失于根基浅薄,“源”何尝没有活力枯竭的危机感?

学术发展是承前继后的连续过程。古代文献既是学术史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也是学术整体推进的宝贵财富;作为精神文明的载体,其价值超越了物理存在的历史局限。它们不应该仅仅因为形成时代、分类体系的不同而被隔离在现代学术图谱之外。古籍另册而立的现状,虽有助于保存传统的学术体系,却也可能因为与现代学术脉流的隔膜,而失去应有的生机。阻断古典学术与现代学术之间本来的联系,这对于古典学术的继承和现代学术的发展都是一大遗憾。

事实上中国古典目录学与西方目录学所代表的现代目录学在当代已经有了汇流融合的基础。在信息大爆炸愈演愈烈的形势下,以学科分类见长的现代目录学体系日益重视书目分析功能的建设,这恰是中国古典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传统的核心优势;而现代目录学体系长久以来在学科分类上的积累,对于在这方面被视为短板的中国古典目录学也将是极为有力的补充。

如果说,曾经的断裂是由特殊的历史时期造成的,那么今天的学界如果期望被视为文化瑰宝的古籍能保持活力、期望当代学术能接续道统,就应努力弥合而不是巩固古今裂痕。活力与生机永远来自于对话,而非各自为政。统一分类体系不仅将使古籍的当代价值、古籍与今籍的学术关系得到彰显,更将为古典目录学与当代目录学的对话提供空间,让我国“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优良传统获得新生。

我与三套经典文献的入藏

□郭生山(《图书馆理论与实践》副主编)

对图书馆采访人员而言,大概都怀揣着一个奢望:不受限制的经费和最全品种的书目。若两个条件同时满足,则购尽天下,达成图书馆的收藏无限,实在是一个无上的美梦。只不过,这个梦想现实中却着实不现实,实际情况并不随人意,往往是连二者居其一也无由落实。图书馆采购实质上从事的是一项委曲求全的工作,总是在经费和文献之间寻找着某种平衡,采购人员是一类被迫戴着镣铐跳舞的人。最现实的目标是用有限的经费去购买最值得入藏的文献,理想与现实之间,实在落差太大。

笔者入职宁夏图书馆已过卅载,或专或兼,一直在从事着文献采访工作,因着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所限,图书馆经费之拘窘,是我们长期存在的苦恼之处。然省级图书馆,文献门类齐备,具有基本完备的馆藏体系,亦不乏各具特色的专藏,由此形成一馆之文献体系与馆藏特色,是最起码的馆藏发展基准,脱此则实不副名也。条件所限,我馆的馆藏建设,始终未臻理想,然我们的标准,向来不曾降低过。既无力追逐求全之藏,取核心文献建设为主的策略乃我们符合实际之举措。尽力而为之下,经典文献,年年有藏,维系着高水准的馆藏质量。

我所经手的入藏文献,已难计数,但某些经典文献的入馆过程,却记忆犹新,再难忘却。这其中,《永乐大典》《续修四库全书》和《中华再造善本》三书的入藏,有着各不相同的方式,个中附着着各样的收藏故事,成为难忘片段。

本馆的《永乐大典》,入藏于2010年,可谓无意之举的收获。当时馆配市场尚不规范,馆配商提供目录不无随机性,且目录极为简略,只罗列书名,再无其他书目信息,甚至无价格一栏。我在勾选时,出于对那几十种文献的了解,料想价格不高,绝不会超出我们的经费额度,故所列书目基本全选。《永乐大典》亦在此书目之列,当时想见不过几册样本罢了,并未当作专门文献特别对待。这只不过是一次普通的精品文献选购事宜,然到货后,却与自己预想大相径庭。《永乐大典》191卷,竟然是当时最全的合辑,价格达到了28万元,远远突破了购书经费的额度。面对此景,一方面惊喜于《永乐大典》的收全,一方面又留下了还账的烦恼。后来经过对文献采购的调整,合理俭省其他文献的购置,才多次筹够了这套文献的资金。回想起来,此事已届十年,如今这套文献已各处难觅,当初不太严谨的选目,却成就了一套珍贵的馆藏。

《续修四库全书》的入藏,我们走过了一条曲折的补购之路。这套文献2002年即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虽则每年将这套文献纳入采购计划,因

价格高昂,常规购书经费无法支付,又一直未能筹措到专项经费,始终不能落实入藏事宜,颇令我等着急。眼瞅着市面留存的数量在减少,急切之念,愈发萦绕心头。逐年惦记很是折磨人,尤其是我作为直接当事者,好多年始终跟踪着这套书的有关信息,却年年因经费不够而罢手,入藏之念,备受挫折。直至2014年,归拢网上信息,似有存货告罄之势。各种筹措,终致网购入馆,完成了一个12年的心愿,实属不易。此文献与本馆1990年购入的文渊阁本《四库全书》汇合,完成了本馆对四库主要文献的配套入藏。

《中华再造善本》,可谓有史以来体量最大的一套珍贵文献,盛世修文,从策划直至问世,文化界关注良多。2010年,上半部《唐宋编》和《金元编》制作完成,国家出资分赠各大型图书馆,大家皆大欢喜。依着思维惯性,本以为下半部《明代编》《清代编》和《少数民族文字文献编》也会随后继赠。然翘首以盼,却迟迟未见赠送确信,多次打问,均不置可否。意料之中的藏品,竟然存在悬念,实不知原委。2017年,汇聚各方信息,确证不再赠送,顿有措置无方之感。传世之宝藏,断不能只收上半部,成残缺之状。2018年,恰逢高层领导来馆调研,在座谈会上,本人冒昧发言,极力建言争取专项资金,购入这套文献的下半部,完善收藏。领导展现魄力,当场拍板,表示支持。会后我们立刻起草报告,很顺利批复了专项资金。接着会同招标公司,制定招标文件,快速按程序办理相关事宜。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将《中华再造善本》下半部购入并验收完毕,妥善保存,使得这套文献实现了完整收藏。

文献采访,是图书馆一特殊岗位。如果说图书馆工作流程具有过程化特性,独文献采访,其工作的结果是积累了馆藏。因此,采购质量,关乎整个图书馆的资源质量,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笔者担此岗位数十年,其间过眼无数具有入藏价值之文献,奈资金掣肘,总不得悉数购入,每每留下遗憾无数,这大概是所有老采访人员的通感。设若普通文献错过,补购渠道尚可多头并举,然大部头经典文献,一旦错过,则会造成难以弥补的遗憾与抱愧,因此,对这些文献的推崇与收藏,必然是采访人员的首选。虽则条件不济,但我们也明白事在人为,只要自己坚持,秉着一份事业心,总会有办法。上述三种文献曲折入藏,就是我们长期坚持寻找时机达成的。完成此等心愿,亦算是自己从事此职业之些许欣慰之处。

(注:本文为“我与图书馆的故事:《图书馆报》创刊10周年征文”三等奖获奖作品)

《赵城金藏》在大藏经研究史上的意义

□李际宁(国家图书馆)

《赵城金藏》，又称《金藏》，是金代雕刻佛教大藏经。1933年范成和尚首先“发现”，该藏开始得到学术界关注。1934年蒋唯心详细调查并撰写了《金藏雕印始末考》，对《赵城金藏》的基本情况做了全面研究，得到全世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尽管如此，有关这部大藏经的许多问题，还如谜一样，有待调查和研究。2017年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以“重走《赵城金藏》之路”为题，对《赵城金藏》相关史事做实地考察，全面调查和收集有关寺院、遗址、碑铭等历史文物，以及涉及抢救和转移的党史人物、机构、历史经过等档案资料，以期对该藏的雕版印刷历、学术研究史、抢救转移和保护历史做全面采访和记录，本人有幸参与该项工作。以下，就《金藏》的学术史价值、文献价值等，作简要探讨。

《赵城金藏》的学术史价值

《赵城金藏》为现代佛教研究 and 振兴,提供了新资料。

北宋以来,中国历朝皆有整理雕印佛教大藏经的传统;对佛教大藏经的雕刻、印刷和供养,也早已成为中国佛教法宝供养的重要特色。到民国初年,宋元明以来各藏,不仅经板早已毁灭殆尽,就是印本,也仅存零卷零本。比较完整的大藏经板,仅剩“乾隆版”一副,也因残损、混乱,非斥巨资和花费大量人力整理修版,几乎没有再使用印刷的价值。

从晚清到民国年间,佛教界和学术界已经感佛教典籍缺乏的窘迫。清末在杨文会等人发起下,金陵刻经处(包括常州天宁寺、上海等地)为出版佛教典籍,做了不少重要工作,有了一些重要成果。但是,佛教界缺乏可以使用的大藏经,依然是一个缺憾。

1930年代在陕西发现了宋元版《磧砂藏》,对刚刚开始复苏的中国佛教大藏经整理和研究,不啻为推动其发展的重要契机。在筹备《磧砂藏》的出版过程中,1933年,范成和尚在山西省赵城县广胜寺发现了《赵城金藏》。这个发现,将近代以来中国乃至世界佛教大藏经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范成和尚与徐森玉居士共同检出《赵城金藏》中稀见经典46种255卷,影印出版了《宋藏遗珍》146册。1935年在中国佛教界很有影响的《海潮音》第十六卷第一号上,以朱庆澜、蒋维乔、欧阳渐、袁同礼、叶公绰、徐乃昌、许文蔚、周叔迦署名的《发行宋藏遗珍缘起》进行介绍,称:“有梵经佚典,有法相秘文,有古德未见之专书,有历代失编之要录。……海内耆硕,力赞其成,巨籍巍然,重兴于世,岂非现代佛化事业中之一大因缘乎!”这部“选辑”的稀见佛教典籍,在后来中国研究中,影响很大。

1934年山西广胜寺发现新种大藏经,支那内学院院长欧阳竟无居士立刻派弟子蒋唯心,从金陵远赴山西赵城,考察这部大藏经的情况。

1934年,蒋唯心在广胜寺连续调查四月有余,逐件详检原件,他的调查成果,撰成《金

藏雕印始末考》,先刊载在《国风》杂志第5期。1935年,又印制单行本由支那内学院发行。

蒋唯心的成就在首次对广胜寺这部大藏经做了全面研究。蒋唯心本文的重要贡献之一,是从《永乐大典》等传统典籍中,挖掘出崔法珍刊经史料,并正确地指出崔法珍与这部大藏经的关系,使一段完全淹没的历史,显露真容。他的研究成果,成为《赵城金藏》研究的里程碑。

发现《赵城金藏》的消息,震动了国内外学术界。《金藏雕印始末考》刚刚发表,日本学术界遂有强烈反映,短短一年有多篇文章介绍《金藏》及蒋唯心的研究,反映了日本学术界对此的重视程度。日本近代以来,受到西方新学术研究方法和理念的影响,对佛教大藏经的整理和研究,正在走上一个新的台阶。1924年在高楠顺次郎、渡边海旭等学者发起下,日本学术界开始整理编辑新的佛教大藏经,这就是著名的《大正新修大藏经》,该藏1934年印行。出版新编大藏经的热度还未降温,在中国发现了金代雕刻的大藏经,学术界关注的程度可想而知。

《金藏》发现的报告,在中国影响更深远。1949年4月,华北地区战争的硝烟尚未散尽,北平图书馆即邀请学术界、佛教界人士,在国立北平图书馆举办《赵城金藏》展览,并做修复研讨,制定抢救该藏计划。

在这次会议上,赵万里先生就这部大藏经的文物、学术价值,做了主题发言:“我个人觉得此藏在学术上有极大价值,主要是其中翻译的经律论赞每行都是十四字,与北宋初年《开宝藏》行款正同,与敦煌发现的唐写本也相类似。小字的疏,每行有反正二十字以上者与敦煌写本也同。所以《赵城藏》与宋以前佛经写本实系同一血统,而为其桥梁者,可能即是《开宝藏》。这两种大藏,我们可以称为北方系。至于普通所见大藏,无不是南系。如北宋《东禅寺藏》《开元寺藏》,南宋《磧砂藏》,以及元时《普宁藏》,明代《南藏》《北藏》,陈陈相因,版本格式皆一样,其内容与北系迥然不同。《赵城藏》所具特点尤为南系大藏所未有。而且《赵城藏》是金时最标准的刻本,在版

本学以及雕版史上尤有价值。所以,无论在佛学或版本学上看来,都是一种绝好的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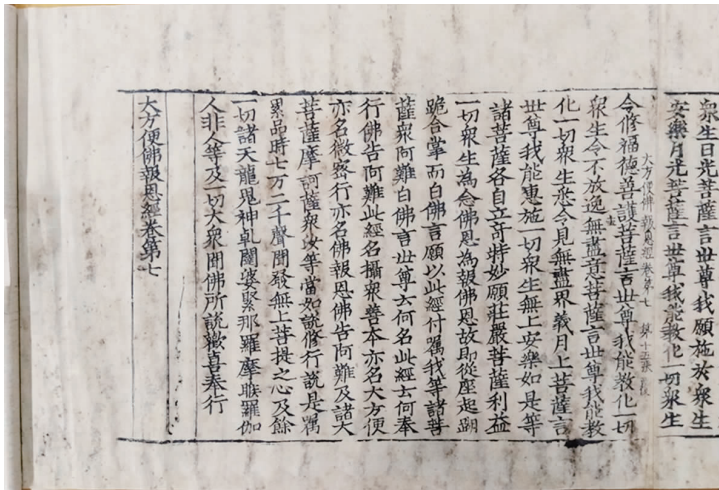
19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即由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决定,任继愈先生主持项目,以《赵城金藏》为基础,编辑新版汉文大藏经,由中华书局出版了《中华大藏经》。

发现《赵城金藏》,以及之后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为当代中国佛教研究和佛教大藏经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成为20世纪以来中国佛教研究复兴的重要标志。

《赵城金藏》的文献价值

1.《金藏》是《开宝藏》的覆刻本,保存了《开宝藏》的文物、文献特点。

蒋唯心《金藏雕印始末考》评价《赵城金藏》的文献意义时说:“对于藏经版本目录校勘诸种研究上将发生如何影响,将估计如何价值,此待有专深之研究以明之。然粗浅而言,崔氏刻藏最为一目了然之特色者,即在覆刻北宋官版大藏经,而不啻为其一肖影也。论其形式,作卷子装,行格每纸二十三行十四字,皆北宋官版藏经之原式也。北宋版本今存于晋南青莲寺者即如此,又丽藏《校正别录》所记旧宋本行格亦如此(日人或谓为梵册式,每页五行,每行十五字,乃讹传耳)。短篇经之纸数各自起讫以便分合,原式也。避北宋诸帝名讳,原式也。文字时有校改,亦原式也(景祐录卷十六有仍取天寿皇建二院经本参校大藏之记事,仍取云者,必其事不自当时始也)。至于经末偶存底本之题记不及刊落,尤足见其迺覆北宋官版而无疑也。更究其内容,祥符、贞元诸经编次错综,并有重出误收之诸籍,详以丽藏目录及丽藏校正别录勘之,在在证明为北宋覆版。著述一门,珍秘之籍触目琳琅,其实亦北宋官版之旧观也。天台、慈恩二家之作二百卷,于天圣年间入藏,天台诸籍且由杭驿版以进,杭版即钱俶从高丽搜访遗文符雕,或记钱俶名字于版末,广胜藏亦一一覆之。其所保存者美矣、备矣。近年经籍之研讨日盛,宋元诸版或校或印,无不可详,独为诸版共同祖本之北宋官刻藏经吉光片羽,似全豹



无所可窥者,孰意天壤间犹有累积五千卷一覆再覆之广胜藏本存其完全面目耶?噫!斯诚不思议因缘矣。”

2.《金藏》保存了一批罕见典籍

1934年《海潮音》第十五卷第五号刊登的范成和尚太虚法师的信中,叙述访经收获:“去夏抱定决心,向山西各古道场寻访,历四十余县,十月之久,最后结果在两处发现若干无上法宝,请为我共述之:一赵城县霍山广胜寺有五代时天下大元帅吴越王钱俶施资所刻藏经,装为手卷式,五千一百余卷中,有三百余卷,是海内孤本,逐一检出,广备流通。先印成《因明论理门十四过类疏》一卷,奉陈法座持诵。”

范成和尚立即与在北京的徐森玉联系,到广胜寺共同辑出四十六种二百五十五卷,印成《宋藏遗珍》上中下三集。

1935年《宋藏遗珍》影印出版,由朱庆澜、蒋维乔、欧阳渐、袁同礼、叶公绰、徐乃昌、许文蔚、周叔迦等学者共同在《海潮音》第十六卷第一号(1935年)刊登《发行宋藏遗珍缘起》。他们在介绍这部大藏经文献价值的时候,给予了高度评价:“总之,此藏之为山西民间所完成,殆无疑义。其版龄距今多则九百五十六十年,至少亦七百八十年以上也。北派刻风,字体朴劲,行款疏密相间,绰有古趣。祇以地处僻左,时际乱离,十方闻见既希,全藏流行遂蹇,而其摄收之弘博,甄选之精严,虽当残缺之余,犹令人惊叹不已……”尽管他们的介绍还未能像蒋唯心的研究那样深入和准确,但是,

《宋藏遗珍》对佛教研究的影响,至今仍发挥重要作用。

3.保存了辽刻本一些特点

对《赵城金藏》中保存了辽藏部分特点的问题,已有学者提到。比如吕澂说:“因为金藏刻版原藏于弘法寺,元初经过彻底补雕,比较完整,元世祖至元初迁都燕京之后,便将它重加整理,收入一些契丹藏经中特有的本子像慧林《一切经音义》等(契丹统治着中国北方时,其势力没有扩及河东南路,所以在金藏的刻版上丝毫未受契丹的影响;元代注意到此,才加以补充)。”

任继愈先生在谈到《赵城金藏》的时候也提到,该藏中有辽藏的数据存在。笔者在整理《赵城金藏》的时候,受此启发,特别关注到这个问题。

4.校勘的意义

吕澂说:“金藏基本上可说是整个宋刻蜀版的翻刻(连同绝大部分的著述在内),所以它和蜀版的关系最深。它保存着蜀版原来很多的缺点,又有天禧以前未被禁止流行的《频那夜迦经》,可见它依据的蜀版是接近于初印本的。现在蜀版和它翻刻的高丽初雕版印本都已散佚殆尽,那么,有这部金藏印本保存它数千卷原来的面目,在版本上、校勘上,实在有其宝贵无比的价值。”

《金藏》是《开宝藏》的覆刻本,在《开宝藏》的版刻历史上,有多次校勘重雕。《赵城金藏》保存了《开宝藏》早期的版本特点,但在后期的印刷本中,《金藏》也要补刊、重雕、修版。故此,研究《赵城金藏》的文本时,要注意到这些情况。